

上海玻璃博物馆

玻璃装饰的生活

撰文 / 摇光 供图 / 上海玻璃博物馆

在《红楼梦》里，黛玉有盏玻璃绣球灯，贾母端详尤二姐要戴上老花镜，就连晴雯对打破玻璃缸的事也见怪不怪。玻璃，这种原本来自西洋的进口货，什么时候闯入了中国市场？又是被如何看待和利用的呢？让我们一起走进上海玻璃博物馆，去探究玻璃背后的故事。



蓝色胎玻璃珠·战国

中国内地发现的时代较早的玻璃器物中，上海玻璃博物馆展出的这种外观颇似“蜻蜓眼”的玻璃珠，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类别。它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0世纪初的地中海沿岸，到公元前6-前4世纪，在黑海和里海沿岸非常流行。考古人员发现，从欧亚草原的西部到新疆以西，分布着大量的“蜻蜓眼”式玻璃珠。这说明在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前，这类珠饰就通过欧亚草原通道，从西往东传入了中国。

上海宝山区长江西路685号，醒目的黑色玻璃外墙冲击着观者的视线，这里就是2011年开幕的上海玻璃博物馆。它原为一座旧玻璃熔炉车间，设计师在重新规划架构时，刻意保留并突出了旧厂房的原有特色，使其别致而新颖。

走进馆内，万花筒入口、顶部的彩绘镶嵌玻璃窗，搭配脚下的玻璃地面，玲珑剔透，移步换景。在精心布置的灯光下，古埃及的神秘容器、精致的波西米亚高脚杯、中国古老的玻璃珠子、晶莹的宋代玻璃发簪和清代的玻璃花瓶、鼻烟壶……一件件展品变幻莫测，宛如一场光影中的盛宴。

置身其中，不由得想到一个问题：对我们的祖先来说，这些玻璃给他们的生活带去了什么呢？

蜻蜓眼与明月珰

一场“古玻璃耳饰”专题展吸引了我的目光。众所周知，自人类有意识以来，便会采集各种各样的石头、贝壳、羽毛装饰自己，玻璃也很早就加入了饰品的大家庭。作为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之一，牧之是我在微博上结识的古玻璃收藏和研究者。他为这次展览挑选的中国历代玻璃耳饰，品类之繁多，制作之精美，让人由衷赞叹。牧之说，这是古人对耳侧之美的追求。这让我想起美国著名珠宝商弗莱德·雷顿说过的话：“如果时尚女士只佩戴一种饰物，最明智的选择一定是耳坠，它将视线锁定于面孔，也会使颈部看起来更修长。”看来在这一点上，古今中西，概莫能外。

在各种古代玻璃耳饰中，耳珰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一类，它的大流行是在汉魏南北朝时期。“乐府双璧”之一的《孔雀东南飞》，在描摹焦仲卿之妻刘兰芝时，曾说她“腰若流纨素，耳著明月珰”。南朝文人刘孝绰也有“美人要杂珮，上客诱明珰”的诗句。“明月珰”、“明珰”都是形容耳珰色泽纯净、温润如玉的视觉效果，这也正是玻璃的特性。

在两汉至南朝的墓葬中，考古人员发现过数量繁多的玻璃耳珰。上海玻璃博物馆的“古玻璃耳饰”展上，几件汉代耳珰代表了当时流行的两种类型：有一对表面有所腐蚀的深蓝色耳珰，一头大一头小，大的一头外敞像个喇叭，中部内收形成束腰，横截面有个空心穿孔，应该是用来穿线，以便悬挂一些小坠饰的，在墓葬中它们通常位于墓主人耳畔。还有一枚淡蓝绿色的无孔耳珰，保存得更完好。它较细的一端做出尖头，另一端则鼓成半球状，整体造型像一只蘑菇，更接近如今流行的耳钉（但也不排除是丧葬所用的耳塞）。看到这种耳珰，我最大的感触是，汉晋南北朝的姑娘为了追求美，甘愿穿这么大的耳孔，牺牲精神真是可嘉。

公元前10世纪初，地中海地区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珠饰品种。工匠们在单色玻璃珠上嵌入不同颜色的玻璃，由于图案主题多为一环套一环的同心圆，就像动物眼睛一样，因此在西方被称为『复合眼珠』。在中国，它有个更加具象的名字——『蜻蜓眼』式珠。



蓝色胎蜻蜓眼弯月形饰·战国

具有“眼睛”效果的镶嵌玻璃珠，最早出现在地中海沿岸，象征正义无畏，据说拥有能驱走恶魔的无限神力。这类玻璃珠传至中国后，中国人对其制法进行大胆改良，使战国成为中国在世界玻璃史上唯一领先的辉煌时期。



与耳饰相比，同样作为装饰品的玻璃珠，历史更为悠久，并且与早期中外文明交流的宏大主题有关，另一场“战国蜻蜓眼珠饰”展就揭开了历史的这一角。

在中外玻璃发展史上，珠饰都是最早的产品。公元前2500年左右，玻璃作为独立的人工制品在西亚和埃及出现后，首先就被用来制作珠饰。先是单色玻璃珠，然后发明了各类彩色珠。大约到了公元前10世纪初，地中海地区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珠饰品种，工匠们在单色玻璃珠上嵌入另外一种乃至几种不同颜色的玻璃，由于图案主题多为一环套一环的同心圆，就像动物眼睛一样，因此在西方被称为“复合眼珠”（Compound eyebeads）。在当代中国，它有个更加具象的名字——“蜻蜓眼”式珠。

中国内地发现的年代较早的玻璃器物中，“蜻蜓眼”式珠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类别。最早的实物出现于春秋晚期的墓葬中，到了战国中后期有大量的发现，成为常见的随葬品。“蜻蜓眼”式珠是中国玻璃工匠自行研发出来的产品，还是来自西方世界的舶来品？曾是一个很受关注的问题。

在镶嵌玻璃珠出现之前，考古人员在中国西周至春秋中期的墓



蓝色胎七星纹玻璃珠·战国

制作这种玻璃珠时，要先将不同颜色的玻璃料拉成细丝，截为薄片，接着用金属棒蘸上粘土浆，在火焰上将玻璃料棍拉细，缠在棒上，然后分别压入不同颜色的薄片，放在金属板上滚动，待冷却后抽出金属棒，即成。

有一次，随国国君出行，看到一条受伤断成两半的大蛇，觉得它有些灵异，便命人以药物敷之，大蛇果然恢复了行动能力。一年以后，蛇来报恩，口衔明珠献给随侯，于是这珠子便有了『随侯珠』之名，又被称作『灵蛇珠』或『明月珠』。



蜻蜓眼嵌片金戒指·古珠新饰

“蜻蜓眼”又被制成圆片、长条形、弯月形镶嵌在其它器物上，彰显主人的华贵身份。上海玻璃博物馆的这枚戒指，嵌片制作于战国时期，指环为后人补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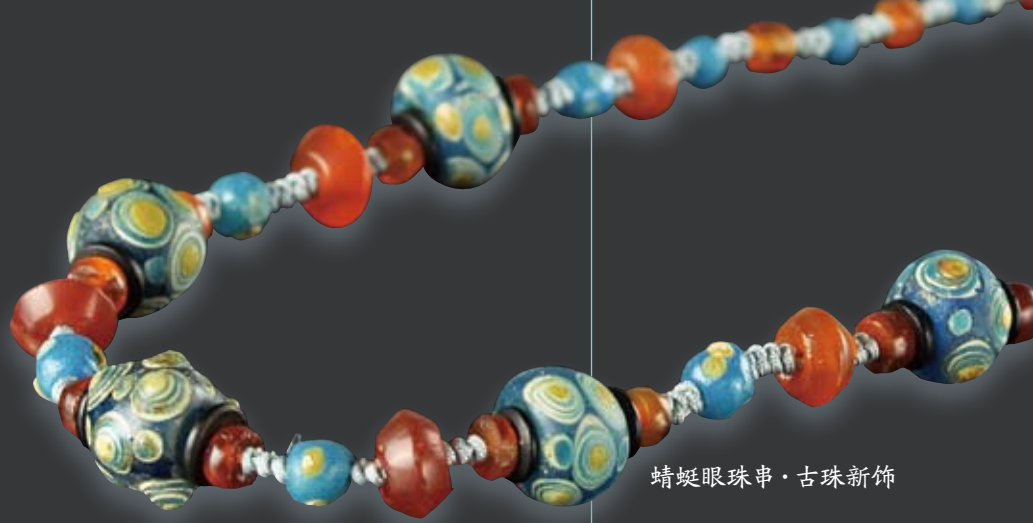
葬里发现过许多含有少量玻璃质、但主要成分还是石英砂的人造珠管，这种产品在西方叫做“费昂斯”（Faience），不少中国学者则称其为“釉砂”。它和玻璃之间虽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但毕竟有着本质的不同，并不能说釉砂珠就是玻璃珠的直接前身。春秋末战国初的镶嵌玻璃珠是突然出现在中国内地的，工艺水平已经相当成熟，而且只在少量的贵族大墓里发现。经过科学检测过的一些珠子，其化学成分与西方玻璃相近，都属于钠钙玻璃系统。由此证明，这种镶嵌玻璃珠可能是当时的进口货。

规模颇大的河南省固始县侯古堆一号墓，墓主人是春秋末年宋国国君宋景公之妹、吴国太子夫差之妻。夫差之妻如何葬于河南？原来公元前504年，吴王阖闾派遣太子夫差率军伐楚，攻下了楚国的番地，位于河南南部的固始，正是被楚国所灭的番国故地。夫差之妻可能随夫出征，在吴国军队占领番地后，由于某些缘故暴卒于此。战时局势紧张，便就地选址安葬，但仍说得上是厚葬。墓中不仅有17具殉人，还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，其中的几颗“蜻蜓眼”式玻璃珠，可能是中国内地发现的最早的一例。我好奇的是，夫差的夫人当年管这种玻璃珠叫什么呢？

我想到了中国古人形容极珍之物时会用到的一个词——“随珠荆玉”。“荆玉”是人们熟知的春秋楚人卞和所献的和氏璧，“随珠”也叫“随侯珠”，据说是随国出产的一种名贵珠子，时代与和氏璧相仿。至于它到底是什么，历代有不同的说法。有人认为是贝类所产的珍珠，有人根据“夜有光明”一语，觉得应该是具有发光特征的萤石，还有人说可能是金刚石，可谓莫衷一是。春秋时期的随国，在今天的湖北随州一带。1978年，这里发现了著名的曾侯乙墓。有专家认为，曾国就是随国。而令人惊奇的是，这座战国早期大墓出土了173颗像蜻蜓眼似的镶嵌玻璃珠。原本藏于历史深处不知为何物的“随侯珠”，很可能就是这些精美绝伦的“蜻蜓眼”式玻璃珠。

不过，曾侯乙墓一次性出土这么多珠子，绝大部分还没有进行过成分测定，如果都系辗转传来，恐怕不会拥有如此数量。墓中还发现了不少陶珠，从外观上看，也明显具有模仿“蜻蜓眼”式玻璃珠的特征。联系到“随侯珠”这一说法的本土文化背景，不能排除其中部分珠子是随国自己制作的，在当年很可能既包括了玻璃珠，也包括了仿制玻璃珠的陶珠，但无论如何，一定都是在外来产品的影响下产生的。

有趣的是，我们的祖先为这种玻璃珠的由来特意编了段神奇的故事：有一次随国的国君出行，看到一条受伤断成两半的大蛇，觉得它有些灵异，便命人以药物敷之，大蛇果然恢复了行动能力。一年以后，蛇来报恩，口衔明珠献给随侯，于是这珠子便有了“随侯



蜻蜓眼珠串·古珠新饰

浅蓝胎蜻蜓眼琉璃珠·战国



蜻蜓眼陶珠串·古珠新饰

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制作技术原本来自西方，中国工匠将其发挥到极致，使灿烂夺目的玻璃珠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王公贵族中间极为受宠。就连这类模仿玻璃珠制作的陶珠，也成了不少爱美女士的心头好。





玻璃耳珰·战国晚期

作为中国最早人工合成材料之一的玻璃，其发展方向与西方的实用路线大相径庭。中国人往往用它来制作首饰，以突显佩戴者的温婉与妩媚。上海玻璃博物馆的这些蓝色玻璃耳珰，光洁莹润，玲珑剔透，女子将之垂坠于耳际间，必定增色不少。

珠”之名，又被称作“灵蛇珠”或“明月珠”。

随侯救蛇得明珠的故事，被记载在《淮南子》、《说苑》、《搜神记》等古籍里。文人也常常引此物入文，曹植在《与杨德祖书》中就写到：“当此之时，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，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。”

正是受了这样的启迪，上海玻璃博物馆为此次战国镶嵌玻璃珠展取名叫“灵蛇献瑞”。不仅应了癸巳蛇年的景，更重要的是，在策展人牧之的理解中，灵蛇在世界上几个古老文明中都占据了一席之地。他认为“古希腊神话里，灵蛇被视为生命的象征，代表着‘优美、智慧与永恒’。埃及法老的王冠、王后的头饰上，灵蛇图样由黄金和宝石精心打制而成，彰显法性的威仪、神性的力量。中国远古神话里，伏羲女娲皆是人首蛇身。这些都是古老灵蛇文化的缩影。”

春秋末年的夫差一家没准也称呼这种镶嵌玻璃珠为“灵蛇珠”呢。不过，严格说起来，灵蛇文化和镶嵌玻璃珠之间最初是否存在联系还值得商榷。记录了随侯救蛇一事的几本书皆产生于汉晋时期，距离春秋已有好几百年，而更早提到随珠的文献，比如《墨子》、

《庄子》，都未曾言及此事。然而，即便身世不明，也丝毫不会减弱镶嵌玻璃珠的魅力。正如牧之所说，当你全身心地将目光投射到这些精美珠饰上时，就如同经历了一场让人等待了两千年的梦幻之旅，它展示的是玻璃工业在其童年阶段的卓越想象力。

战国中晚期，中国内地已经能够自行生产玻璃，“蜻蜓眼”式珠的出土数量便迅速增长，不仅见于高等级墓葬，在一些普通型墓葬中也有发现，可见已是较为常见的装饰品。包括随国故地在内的广阔楚地，就出土了数量不菲的“蜻蜓眼”式珠。中国工匠们殚精竭虑，完全掌握了它的生产技术，并将其发挥到极致。

“灵蛇献瑞”展就集中呈现了这一时期的成就。在我们面前，不仅有常见的圆形珠，还有椭圆形珠、方形珠、锥形珠、长管形珠等新出现的造型。同心圆纹饰虽然继续存在，但比重已然下降，各种各样的图案组合纷纷呈现。特别有趣的是，嵌入的部分有的开始突出于珠子母体，像一个个小棱角，显得更为生动活泼。除了作为单体装饰，工匠们还制造圆片、长条形、弯月形蜻蜓眼，镶嵌在别的器物上做装饰。展览中有一件漆壶，它的外壁原本嵌满了玻璃珠，到如今，还依然保存有部分蓝色勾云形和圆形小珠。从化学成分上看，这些展品与前期钠钙玻璃为主的情况大不相同，绝大部分珠子都属于用氧化铅和氧化钡做助熔剂的铅钡玻璃，与同时出现的仿玉器的玻璃璧、玻璃剑饰、玻璃印章一起，构成了中国早期自制玻璃的洋洋大观。

能装下马和骡子的玻璃瓶？

如果说珠子因为个体小便于随身携带从而能传到远方，那么怕颠簸、易破碎的玻璃容器，大概必须借助使节或商人的专心呵护，才有可能翻越崇山峻岭，渡过河流险滩，到达另一个陌生的世界。随着张骞“凿空西域”以及海上交通的开通与发展，汉代以来，容器成为传入中国的西方玻璃器之主流，呈现出新的时代面貌。

在著名的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的技术支持下，上海玻璃博物馆在常设展第二单元“技术和工艺的发展”中，介绍了西方古代玻璃的发展概况。牧之告诉我，展出的这些西方古代玻璃皆为近年从欧洲文物市场购入，不少属于晚期罗马玻璃。

容器的生产是玻璃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。中国大概在西汉早中期便拥有了生产玻璃容器的技术，但由于配方的问题，质量一直不佳。甚至到了宋代，还有人在评价国产玻璃时说：中国的玻璃和西方的产品不一样，前者色彩光鲜，但质地轻脆，一倒上热酒就会破裂，而来自海外的玻璃虽然色泽要差一些，但即便注入滚沸的汤水

扬州城里来了个叫胡媚儿的乞丐，他有一个瓶口像芦苇杆一样细的玻璃瓶，容量大概能装半升。胡媚儿对大家说，如果各位的施舍能把瓶子装满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于是就有人往里面投了百文钱，结果，奇迹出现了，投进去的钱竟然变得跟小米粒一样大……



彩绘蜻蜓眼陶狗一对·战国

“蜻蜓眼”式珠又被称为“灵蛇珠”。不过，比照古希腊神话中灵蛇的象征意义，中国人对“灵蛇”意象的运用，就显得自由得多。比如这对明显仿照“灵蛇珠”纹饰彩绘而成的陶狗，它的用途，似乎就与“神性”无关。

尽管中国也能生产大件玻璃容器，但当这些质量更佳的西方玻璃器进入中国后，立即变身为稀有而昂贵的『宝器』，让见惯了金银玉石的国人大为惊讶。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们的祖先对『西方玻璃到底源自天然还是人工制造』这个基本问题都弄不清楚。

也没事，跟瓷器、银器差不多。

在陶瓷器、金属器、漆木器充斥市场的古代中国，玻璃器基本都是舶来品，虽然数量始终不多，却在某些方面深刻影响了国人的生活。

中国发现的古代西方玻璃容器，大体属于罗马、萨珊波斯和伊斯兰三大玻璃系统。它们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东方。罗马玻璃指的是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时期生产的玻璃制品，这是世界玻璃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。到了公元3-7世纪，伊朗高原的萨珊玻璃继承了罗马玻璃的一些工艺特点，特别是发展了在器物外壁进行的磨琢技法，喜好装饰连续的圆形纹。7世纪中叶，阿拉伯帝国崛起，在罗马和萨珊玻璃工艺的基础上，伊斯兰玻璃得到了长足发展，金属光泽玻璃、釉彩玻璃都是伊斯兰的发明。

上海玻璃博物馆展出的罗马玻璃器，种类上有各式长颈瓶、带把瓶、圈足碗等，从公元2世纪的淡黄色玻璃花瓶，到4世纪的紫色玻璃水壶，都属于日常生活用品，是西方常见的种类和造型。其中的一件绿色长颈玻璃瓶，让我想起了1987年出土于河南洛阳东郊东汉墓的一件形制相似的玻璃器，后者从口部到底部都有螺旋状的白色线纹，与中国传统的器物造型完全不同。2011年，我在中东学习期间，曾前往以色列南部死海沿岸的马萨达遗址参观，那里有一座博物馆专门收集和展出当地出土的文物，其中就有玻璃器。当我走近观赏时，发现有件玻璃瓶和洛阳出土的那件十分相似，随即拍下照片，等回到研究所找出洛阳玻璃瓶的图片，一比对，两者无论造型、工艺还是纹饰、尺寸都如出一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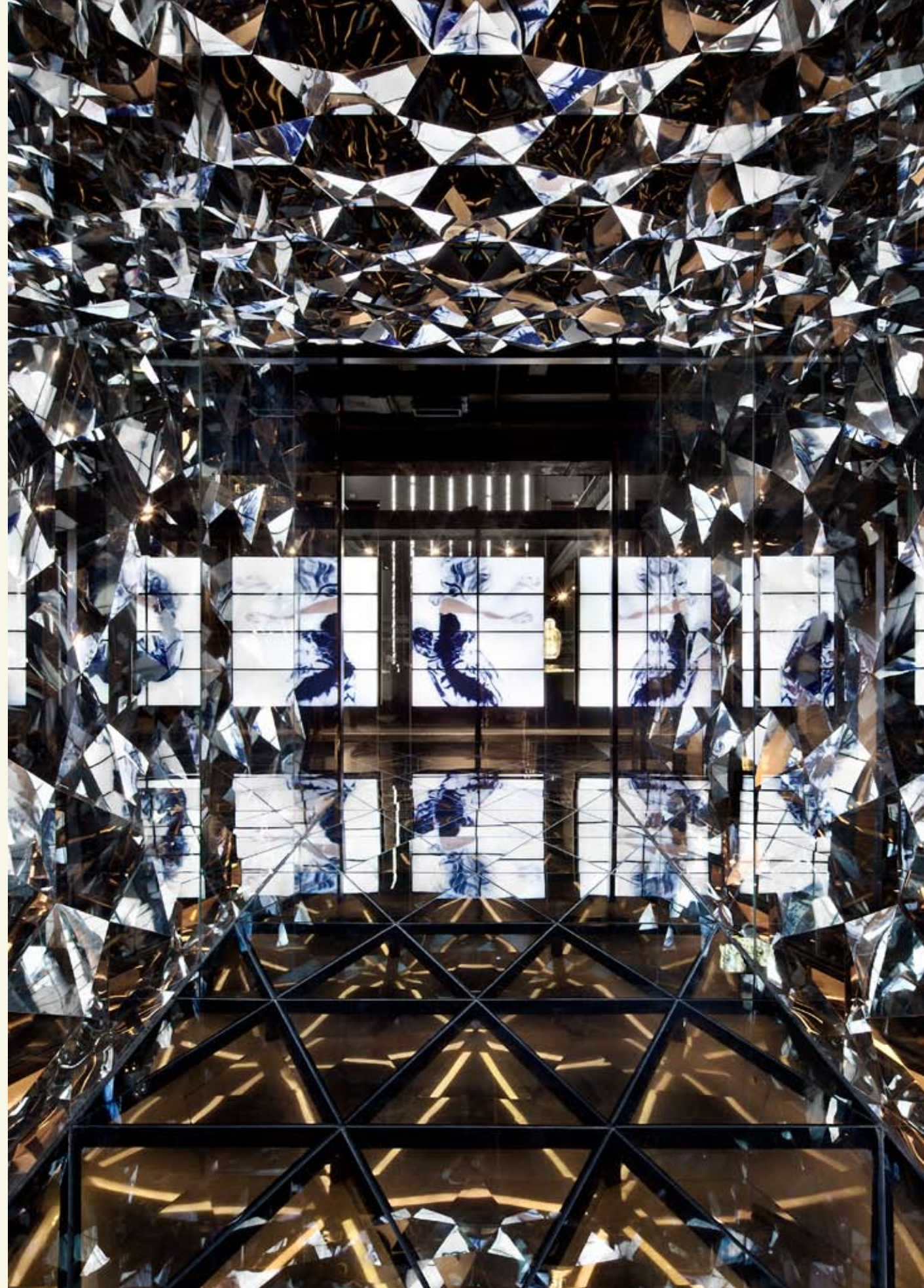
马萨达是公元前1世纪后期希律王修建的要塞，公元73年在罗马第十军团围困下失陷，该遗址出土物的时代基本属于罗马帝国早期，那么这件瓶子的下限应当也不晚于公元73年，可能是公元1世纪中前期的产品，和洛阳玻璃瓶的时代非常接近。由此推测，这三件形制雷同的器物都是公元1世纪的罗马玻璃，用来盛放香水，产地很可能就在地中海东岸。

公元前1世纪中期，大概是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地中海东岸的罗马玻璃工匠在实践中发现，液态玻璃有一种特殊的可塑性，那就是可以用一根空心金属管挑起玻璃液，在其逐渐冷却的过程中，通过吹气进行塑形。这个在今天看起来无比简单的事情，却是世界玻璃发展史上伟大的技术革命。此前数千年流行的卷芯法、模铸法等玻璃生产工艺，逐渐被吹制法取代。由于此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，玻璃器从此成为相对廉价的商品，开始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。在之后中东和欧洲的考古遗址中，玻璃更成为最常见的出土物之一，与中国田野考古中陶瓷器的出土情况很是相似。



博物馆·从熔炉车间到艺术空间

昔日工厂的巨型窑炉，经过改造，华丽转身为通彻浪漫的“玻璃屋”。置身其中，就如同经历了一场光影斑驳的奇幻之旅。右图为主展厅入口处的万花筒式玻璃走廊。





亲历·分享玻璃的无限可能

每周二至周日，都会有大量观众来到上海玻璃博物馆的热玻璃演示厅，近距离观赏玻璃吹制的奇妙瞬间。如果有人兴致勃勃想要一试身手，也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，亲自体验一把玻璃设计制作的乐趣（见右页图）。摄影/一涯

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专门为上海提供了一张吹制玻璃器的照片，那是一件公元1世纪由罗马帝国生产的双耳罐，器高117毫米，透明的蓝色玻璃罐身上，夹杂着不透明白色、红色和黄色玻璃斑点。据专家考证，罗马工匠在制作这件器物时，应先以吹制法做出玻璃罐锥形，再采用千花玻璃工艺，将各色玻璃片镶嵌到表面，重新加热使其平整，最后添加两个把手。如果单看照片，你很难想象眼前这件极具现代感的玻璃容器，其实是两千年前的作品。

恐怕彼时的中国人也会像今天的我们一样，为西方玻璃器的精妙所折服。藏在康宁玻璃博物馆的这件器物也许并不曾远渡重洋来到中国，不过，在它的“同乡”中，有过“访华”经历的显然不少。遥远的空间距离导致进口玻璃身价倍增，尽管当时中国自制玻璃的历史已经不短了，而且也能生产大件容器，但当这些质量更佳的西方玻璃器进入中国后，立即变身为稀有而昂贵的“宝器”，让见惯了金银玉石的中国人大为惊讶。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们的祖先对“西方玻璃到底源自天然还是人工制造”这个基本问题都弄不清楚。连博学多识的唐代大学问家颜师古也产生了误解。他引用西晋古书《魏略》里面的话说：“大秦国（即罗马帝国）出赤、白、

黑、黄、青、绿、缥、紺、红、紫十种流离”，这些都是天然材质，非常珍贵，而传入中国的玻璃，是把石头熔化加上各种药物烧制成的，质地脆不耐用，不过是人工仿制品，并非真正的玻璃。

正是由于认识上的模糊不清，人们给西方玻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《太平广记》记录了一则唐代的故事：扬州城里来了个叫胡媚儿的乞丐，他有一个瓶口像芦苇杆一样细的玻璃瓶，容量大概能装半升。胡媚儿对大家说，如果各位的施舍能把瓶子装满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于是就有人往里面投了百文钱，结果都跟小米粒一样大。大家很惊奇，又投了千文、万文，依然如此，有人索性把马和骡子放进瓶子，居然看起来也像苍蝇那么小。后来有个官员乘车经过，感到好奇，就问胡媚儿能否将这十多辆车投入瓶中。只见媚儿微侧瓶口，大喝一声，车子果真纷纷进了瓶子，他自己也跳了进去。官员大惊失色，一把摔碎玻璃瓶，结果却什么也没有。一个多月后，有人在别处看到胡媚儿正率领车队行进……

这个故事开头说胡媚儿忽然出现在扬州，人们“不知所从来”，他自称姓“胡”，很可能就是从西域来的。由此可见，在唐人心中，西方玻璃器往往与某种神力联系在一起。或许正因如此，外来玻璃在社会上层颇为受宠，甚至成为他们相互“斗富”的筹码。《洛阳伽蓝记》卷四记载的一个故事最具代表性：北魏河间王元琛在当时的王公贵族里“最为豪富”，在一次高朋满座的宗室宴会上，他向来宾炫耀所藏的诸多“宝器”，其中酒器包括“水晶钵、玛瑙（杯）、琉璃碗、赤玉卮数十枚。作工奇妙，中土所无，皆从西域而来”。元琛为之自豪的这件宝贝玻璃碗，明确可知是从西方进口来的。

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还是来自于考古发现。东汉至辽宋时代的外来玻璃器，绝大多数都出自规格很高的墓葬。它们的主人，有东汉的诸侯王、东晋的世家大族、北燕的皇弟、北周的封疆大吏，还有辽代的公主。这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，不仅生前喜爱把玩外来玻璃器，死后还要将其带在身边，足见珍爱的程度了。

魏晋南北朝是西方玻璃容器进入中国的第一个高峰期。根据我的统计，建国以来发现的这一时期可确认为外来的玻璃容器至少有近30件，分藏于各地的博物馆。上海玻璃博物馆的展览中选取了其中一些器物的图片。将它们稍加分类，就能看到碗和杯这两类器物所占比例极大，皆属于饮食器。如果翻阅东汉六朝的文献，会发现提到玻璃器（当时普遍称玻璃为“琉璃”）时确实常以碗说事（碗，旧体字多写作“椀”或“盥”）。比如，东汉有个叫秦嘉的人出门在外，妻子徐淑给他写了一封家书，说托人捎去一些日常用品，其中有一枚玻璃碗，可以让丈夫拿来服用药酒。《世说新语·纰漏篇》写到，东晋名臣王导的本家堂兄王敦，娶了晋武帝女儿襄城公主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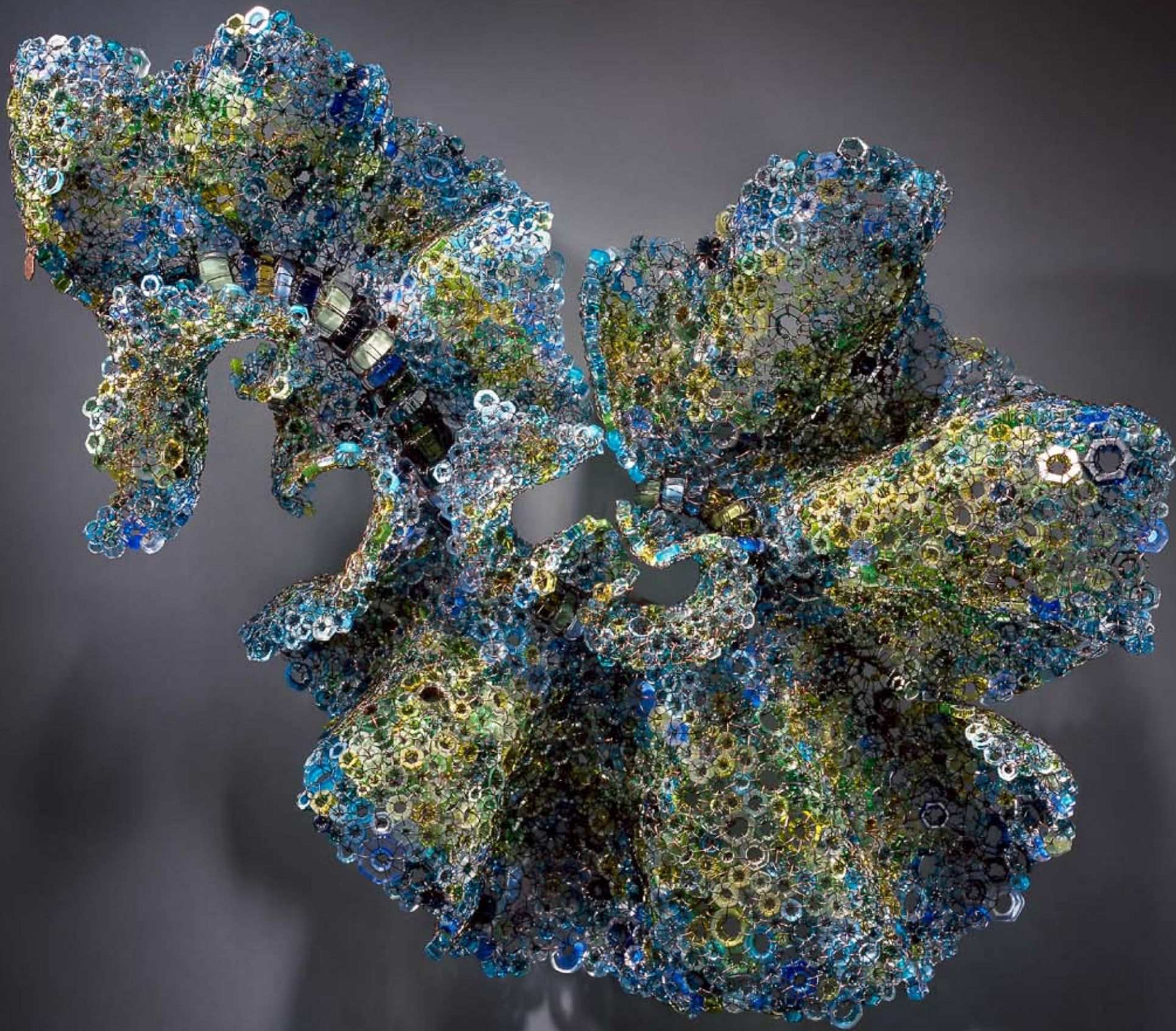
（下接39页）





古与今·质同而趣异

纵观世界玻璃发展史，古罗马可谓举足轻重。不仅因为那里发明并综合运用了吹制、雕花、搅料等各种技术工艺，更重要的是，罗马帝国强大的影响力，使玻璃器及其制作技法被传播到世界各地。上图为上海玻璃博物馆展出的公元4世纪古罗马玻璃水壶。右图则是美国当代玻璃艺术家Kait Rhoads的作品“飞翔”。时光更迭，玻璃艺术革新的脚步也仿佛插上了翅膀。





（上承35页）

妻。这个新晋驸马对皇家的生活习惯没概念，上完厕所，女仆端过来一只“琉璃碗”，里面盛着洗手用的澡豆。王敦以为这是炒面一类的“干饭”，就着水便喝下去了。

虽然罗马和萨珊的玻璃器皿除了碗、杯外，还有很多其他品种，应用面也远不限于饮食，但中国社会好像有所偏好，特别是南方六朝早中期墓出土的一批来自罗马萨珊的玻璃碗，给人趣味相投的印象。

六朝时期发现的外来玻璃器还有个显著的特点，就是装饰上相对简单，大多数只用磨花工艺，基本都为无模吹制，多为无色透明及淡黄绿色一类的浅色。但如果随便翻开一本西方古玻璃图录，即可见大量彩色器皿（艳色和深色尤其多），以及使用复杂的装饰工艺、采用有模吹制而使装饰图案繁复的器物。从这个大背景来观察六朝的外来玻璃，大概能觉察出中国社会的审美取向。

西晋有个叫潘尼的文人，写了一篇《琉璃碗赋》，夸赞玻璃“凝霜不足方其洁，澄水不能喻其清”、“流景炯晃以内澈，清醴瑶琠而外见”，他为玻璃碗的清澈而倾倒。无独有偶，东晋名臣王导曾举起一只“琉璃碗”向另一位大臣周顗（yǐ）提问：“此碗腹殊空，谓之宝器，何邪？”周顗回答：“此碗英英，诚为清澈，所以为宝耳！”他看中这只玻璃碗的品质正是它的“清澈”。由于这时的中国本土玻璃仍多加入氧化钡，并不显得纯净，在这样的对比下，东晋的葛洪便在《抱朴子》中，形象地将西方玻璃器称为“外国作水精碗”，无疑也是欣赏其清澈的特征。看来，六朝社会对高洁、清雅生活方式的追求，也反映在他们对外来玻璃器种类的选择上，清澈透明予人以强烈的感受，甚至被比拟为道德君子的象征。

当然，究竟是西方的使节、商人投中国精英之所好，还是中国精英只接触到了这类风格清爽的饮食器，从而由物质到精神形成了审美倾向，还是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有趣问题。

宝玉的玻璃灯，贾母的老花镜

玻璃的用途极为广泛，上海玻璃博物馆常设展的第三单元“从日常生活到科技前沿”，就在述说玻璃的各种功能。展厅里布置了一面由著名的瑞士插画工作室Jacques & Brigitte创作的巨大城市绘画墙，墙上绘写着令人好奇的疑问：玻璃能有多大？玻璃能飞得多高？玻璃如何能说话？玻璃怎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？

从古至今，玻璃确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。比如玻璃灯。

宋末元初的周密有一部记录南宋都城临安生活的《武林旧事》，说到那时临安的灯会上有苏州进贡的“苏灯”和新安进贡的“无



吹制法·玻璃“雕塑”的诞生

公元前1世纪左右，叙利亚人开创了玻璃吹制技术，随后吹制法流传于罗马帝国，并成为当时制造玻璃器皿的主要方法。上图中这件古罗马时期的淡绿色平底直颈玻璃瓶，即采用吹制法制作。而左页图中，来自意大利莫拉诺琉璃世家的Davide Salvatore，则用娴熟的吹制技巧，为这件“透明古柯叶”赋予了一种雕塑般的、令人目眩的美。

到了清代，中国已经能够自行生产眼镜了，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就设有眼镜作。而在《红楼梦》『荣国府元宵开夜宴』一节里，贾母手边放着一个眼镜匣子，她『歪在榻上，与众人说笑一回，又自取眼镜向戏台上照一回』，这个动作莫非是拿了某种望远镜来看戏？

骨灯”，都采用了玻璃作为主要构件，后者是“浑然玻璃球也”。在一千年前的夜晚，这些玻璃灯胜于绢纸的剔透效果，一定让杭州城里的男女老少瞪大了眼睛！

《红楼梦》里也提到了玻璃灯。第四十五回，宝玉在秋雨之夜前往潇湘馆探望黛玉，临走时，黛玉见雨下得紧了，问宝玉：“可有人跟着没有？”两个婆子回答：外面有随从拿着伞点着灯笼等着。黛玉笑着说：“这个天点灯笼？”宝玉说是明瓦做的，不怕雨。黛玉听了，回手把书架上的玻璃绣球灯拿了下来，命人点了一小支蜡烛，递给宝玉，说这个玻璃灯要更亮，正适合雨夜用。宝玉说他自己也有一个，因为怕下人滑倒打破，所以没用。宝黛都有的玻璃灯，应该就是用玻璃做灯罩的，这灯名字里有“绣球”二字，黛玉又说“轻巧又亮”，适合雨里自己拿着，可见要比宋代元宵夜展出的那些玻璃灯要小，但应当精巧胜之，所以连一向不爱惜身外之物的宝玉也舍不得带出来。

除了宝黛的这件传情之物，《红楼梦》里所见的玻璃制品还有许许多多：怡红院宝玉卧房安着玻璃窗，恐怕是西洋制造运至中国的；晴雯“撕扇子做千金一笑”时，嘴里嚷道：“先时候儿什么玻璃缸，玛瑙碗，不知弄坏了多少”；最让人印象深刻的，恐怕是尤二姐初见贾母时的描写：“贾母又戴了眼镜……细细瞧了一遍……瞧毕，摘下眼镜来。”

相信这个细节会让读者眼前一亮，眼镜于公元13世纪发明于意大利，元明时期已有不少西洋眼镜运至中国，到了清代，中国已经能够自行生产眼镜了，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就设有眼镜作。而在“荣国府元宵开夜宴”一节里，贾母的手边放着一个眼镜匣子，她“歪在榻上，与众人说笑一回，又自取眼镜向戏台上照一回”。如果说打量尤二姐的时候贾母戴的是老花镜，那么看戏的时候“取眼镜向戏台上照一回”，这个动作莫非是拿了某种望远镜来看戏？

众所周知，望远镜于1608年由荷兰人发明，明清之际传入中国，以曹雪芹的出身，他写作红楼的时候是有可能见过西方来的新奇玩意，所以将其写入书中也算是增色不少。这一点又让我想起《西京杂记》里记述的一则关于汉武帝的轶事。其时，身毒国（即印度）进赠给大汉朝一件白光琉璃鞍，汉武帝把它放在暗室里，据说能“光照十余丈”。

不管是两千年前的琉璃鞍，还是四百年前的望远镜，大抵都是远道而来的稀罕物件。玻璃这种材质，原不是中国所特有，更不是中国工匠所独创，但却曾让古代中国熠熠生辉，就像使上望远镜看戏的贾老太太，生活变得更有滋有味。□



延伸阅读 更精彩

改变·西来的“宝物”

孩子们身下的这片六边形区域，其实是上海玻璃博物馆的地下展柜，展示了在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一环——丝绸之路。“温柔易碎”的玻璃器皿，在使节或商人的悉心呵护下，穿越漫长路，来到远东的中国，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。这种改变，直到今天仍在继续。摄影/一涯